

户籍管制的城市差异研究

邹 一 南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当前, 各地维系户籍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就业和控制公共服务溢出, 而行政级别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城市所制定的户籍管制政策也有所不同。总体而言, 就业形势越严峻、公共服务支出水平越高, 则户籍管制越严格。具体而言, 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通过户籍管制来控制公共服务溢出的倾向越明显, 但保护就业倾向则不明显; 东部发达地区城市较中西部地区城市利用户籍管制来保护城镇就业和控制公共服务溢出的倾向更为显著。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缩小城市发展差异, 引导人口的合理流动。

关键词: 户籍管制; 城市差异; 就业; 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 (2014) 01-0142-07

一、引 言

近年来, 户籍制度在全国各地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学术界围绕户籍制度变迁动因也展开了深入的探讨。现有的研究囊括了影响户籍管制的诸多方面, 如公共产品供给、地区间的税收竞争、外来人口的人力资本贡献、财政分权、本地居民的就业保护等。^①但这些文本大多是在国家层面上研究户籍制度, 较少深入到城市层面探讨不同城市户籍管制程度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很大差异, 基于全国或分省数据的研究很容易掩盖不同地区户籍管制政策制定的真实状况。因此, 从城市层面研究不同城市之间户籍管制程度存在差异的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现有的少数从城市层面研究户籍制度的文献中, 蔡昉和都阳利用不同城市的数据验证了城市户口所隐含的不同福利是导致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出现差异的原因, 指出自我融资型城市对经济的繁荣昌盛更加重视, 对能够为本地经济做出贡献的外来人口持欢迎态度; 补贴型城市则积极寻求更大范围内的资源再分配, 担心各种福利、补贴“外流”。^②丁菊红和邓可斌则认为转型环境中财政分权是影响城市户籍管制水平的根本性因素, 他们利用 19 个副省级以上城市的数据分析证明财政分权度与户籍管制程度呈显著负相关, 户籍管制程度与软公共品供给增长速度呈显著非线性 U 形相关。^③汪立鑫等学者通过构建一个最优户籍政策模型发现, 城市管理者所设定的户籍门槛, 与城市人力资本回报率、对市民征税税率、人力资本对本地 GDP 增长贡献率、周边城市对外来劳动力吸引力等因素呈负相关, 而与城市管理者对当地市民福利增长的重视程度呈正相关, 他们还利用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验证了该模型的推论。^④

上述研究从城市层面对户籍制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 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 户籍管

作者简介: 邹一南 (1986—), 男, 江苏徐州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1206360049)、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区域发展总体格局研究”(13XNH072)。

① 付文林 《人口流动的结构障碍: 基于公共支出竞争的经验分析》, 《世界经济》2007 年第 12 期; 夏纪军: 《人口流动性、公共收入与支出——户籍制度变迁动因分析》, 《经济研究》2004 年第 10 期。

② 蔡昉、都阳 《转型中的中国城市发展》, 《经济研究》2003 年第 6 期。

③ 丁菊红、邓可斌 《财政分权、软公共品供给与户籍管制》, 《中国人口科学》2011 年第 4 期。

④ 汪立鑫、王彬彬、黄文佳 《中国城市政府户籍限制政策的一个解释模型: 增长与民生的权衡》, 《经济研究》2010 年第 11 期。

制程度的指标选取值得商榷,有些研究成果使用城市当年新增移动电话用户数作为在当地工作并愿意获得户籍的人数的代理指标,这会产生较大的误差。还有些论文使用城市户籍人口迁入率来反向衡量户籍管制水平,这种方法也不精确,因为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每年的户籍迁入人口很多,而一般的地级市人口则相对稳定,但显然不能认为北京、上海的户籍管制程度要低于一般的地级城市。其次,样本数据的选取大多采用省会以上城市数据,但很多非省会地级城市的户籍管制问题也十分突出,忽略这些城市将影响对户籍制度维系原因的全面把握。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构建合理的户籍管制程度指标,将全部地级以上城市纳入分析框架,从城市层面研究户籍制度得以维系的决定性因素,并探讨不同行政级别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城市户籍管制程度存在差异的原因。

二、城市户籍制度差异原因的理论分析

(一) 我国人口迁移的城市差异特征

以人口聚集为特征的城市化过程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进行。第一条途径是城市数目的增加,即通过新建城市来促进城市化的进程;第二条途径是现有城市的持续扩张,通过人口迁移的方式不断增加城市人口,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城市化。在我国,第二种方式占据主导地位。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村劳动者和中小城市居民持续向省会城市或经济发达城市迁移,并持续至今。

由于经济的集聚效应,大城市本身就能吸引更多的资源和人口。在市场体制下,城市的最优规模应位于人口增长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之处,当人口规模大于这一最优值时,将产生集聚不经济,城市的生产和人口会自发外迁。但是在行政集权体制下,大城市的规模会持续增大。一方面,政府具备扭曲市场信号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为了利用大城市的集聚效应,迅速提高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政府倾向于实行促进大城市发展的政策,如降低工业土地成本、增加投资补贴、改善交通设施和实行税收优惠等,从而降低大城市生产活动的边际成本,扩展集聚经济区间;另一方面,城市被划分为不同的级别,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等,一些经济特区和具备明显区位优势的城市也因其特殊的地位成为“计划单列”城市或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①而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在社会资源配置中享有的优势就越明显,也就越容易分享到体制内和衍生于体制的各种社会资源,因此,大型企业和事业单位也都向大城市集中,使大城市产生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及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

经验事实也为上述推断提供了支持。根据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由4.59亿增加到6.7亿,增加了2.11亿。其中,仅四个直辖市城镇人口10年间就增长了2170万,占同期全国城镇人口增量的10.3%;19个副省级以上的城市城镇人口10年间增长了5034万,占同期全国城镇人口增量的23.9%;东部地区10年间城镇人口增加6069万,占同期全国城镇人口增长量的84.8%。可见,人口向行政级别高、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集中的趋势十分明显。

(二) 城市户籍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

户籍制度本是政府对居民的基本状况进行登记和管理的一项行政管理制度,但中国的户籍制度,却远远超出了其通常意义上的职能。当年作为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制定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其目的是把城乡人口的分布和劳动力配置予以固定。但是,仅仅依靠户籍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难以有效控制人口的流动,一项制度的有效运行需要其他制度的配合。为此,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相关制度和政策,作为户籍制度的补充,从而形成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体系”。这些制度和政策的核心构成要素包括粮食的统购统销制度、城乡不同的就业制度和城乡不同的公共服务保障制度。^②

户籍制度体系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成为了户籍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在户籍管制的条件下,政府

^① “较大的市”指由国务院根据省(区)人民政府请求而个别批准确认,授予地方立法权的城市。目前,我国“较大的市”有49个,其中省会城市27个、经济特区城市4个、其他城市18个。这18个城市包括唐山、大同、包头、大连、鞍山、抚顺、吉林、齐齐哈尔、青岛、无锡、淮南、洛阳、宁波、淄博、邯郸、本溪、苏州、徐州。

^② 张昭时《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形式、程度与影响》,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经济学院,2009年,第32-34页。

可以按照城市发展的需要来控制外来人口的流入数量,以防止城市粮食供应不足、失业率的上升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外溢。当政策环境相对宽松时,户籍准入的门槛就会低一些,当约束条件较紧时,政府就倾向于选择更为严格的户籍管制政策。在改革开放之前,粮食生产和供应是主要的制约因素,因此城市户籍迁入数量的增加必须与基本农产品的供应增加相适应。改革开放以后,粮食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粮食供给已经不再构成户籍管制的主要制约因素。于是,保证本地人口就业、满足城市居民对的公共服务的需求,就成为城市管理者在制定户籍管制政策时主要考虑的因素。

对于城市管理者而言,保证本地户籍城市居民较高的就业率是其政绩考核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当前越发强调社会稳定的背景下,因大量城镇居民失业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任何政府都无法承受的政治成本。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在面临体制改革或经济紧缩引发的失业时,所采取的应对方式截然不同。由于农村户口对应着一定量的耕地,农民工如果无法在城市获得就业岗位,可以返回农村务农,这就是农业对劳动力的“蓄水池”功能。而失业对于城镇劳动力则意味着成为城市无业游民,他们不仅要面临经济上的窘迫,还要承受来自社会其他成员的嘲笑、排斥和歧视,因此,城镇劳动力在失业后往往会不满、滋事乃至有可能从事违法犯罪行为。

于是,户籍管制成为城市管理者保护城镇劳动力就业从而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手段。研究表明,在现有户籍制度体系下,劳动者拥有城市户口,对其获得主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岗位、或在失业后在政府扶持下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有很大的帮助。^①在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一个就业岗位阶梯,位于这个阶梯顶端的是城镇单位就业岗位,^②拥有本地城市户口的劳动者不仅几乎垄断了所有的城镇单位就业,而且在与农民工竞争个体私营岗位的过程中也具有优势。当城镇单位就业需求减少时,城市户籍的劳动者将凭借这一优势挤占农民工在个体私营企业内的就业岗位,并使后者成为非正规就业人员^③或返回农村务农。近20年来我国城乡各类就业人数随就业形势变化而此消彼长的态势表明,当就业形势恶化时,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减少,非正规就业和农业就业人数随之增加,户籍管制也将趋于严格;当就业形势好转时,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增多,非正规就业和农业就业人数相应下降,户籍管制也将趋于宽松(见图1)。这表明城市户籍的劳动力得到了明显的就业保护,并始终处于城镇就业岗位阶梯顶端,而城镇就业形势是决定户籍管制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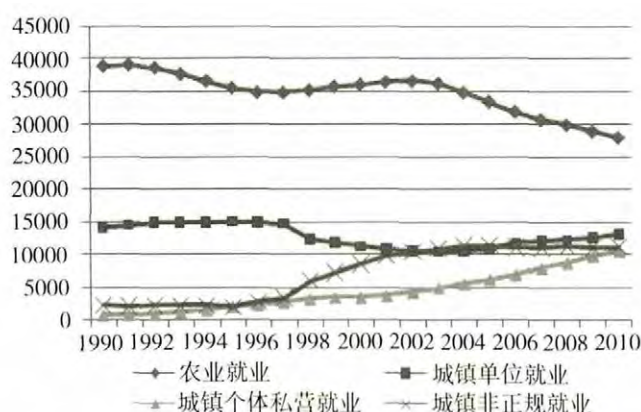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城乡就业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

① 乔明睿、钱雪亚、姚先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户口与城乡就业差异》，《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1期。关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参见P. B. Doeringer and M. J. Piore, *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71, pp. 64-92; W. T. Dickens and K. Lang, “A Test of Dual Labor Market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5, No. 4 (Sep. 1985), pp. 792-805.

② 单位就业岗位是指在各级国家机关、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及企业、事业单位中的就业岗位。

③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非正规就业人员包括自营劳动者、家庭帮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雇员等;在实际操作中,以统计年鉴中城镇就业人数减去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和城镇个体私营就业人数的余额就是非正规就业人数。

除了保护本地城镇人口就业以外,户籍管制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控制城市公共服务的溢出。在分权体制下,人口流动一方面会给流入地带来新的税基,并促进经济增长,但同时也给当地的公共品供给带来压力。过多的人口流入会造成教育设施、卫生服务、社会保障、公共交通等公共品供给的短缺问题,并出现公共支出的正外部性,使人口流出地政府搭了便车。这对人口流入城市的公共财政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由于诸多公共服务的获取与本地城市户籍相关联,城市政府往往倾向于通过户籍管制限制享受公共服务的人口过快增加,而对其余未获得本地户籍的迁移人口实行“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排斥”的措施。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待遇方面与城市本地居民存在很大差距。^①

由于人口流动往往指向行政级别高、经济发达的城市,而这些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也普遍较高。因此,可以预期行政级别越高、经济越发达的城市往往越倾向于设置更严格的户籍管制。付文林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总支出是城市人口增加的格兰杰原因,而城市人口增加不是地方政府总支出的格兰杰原因。^② 这表明,城市的高水平公共服务支出是吸引人口流入的重要因素,但人口流入却并没有显著增加城市的公共服务支出。显然,控制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溢出效应的正是城市的户籍管制政策,而公共服务支出不同城市对户籍管制政策的差异化影响则有待实证分析的验证。

三、城市户籍管制差异的实证检验

(一) 方法和数据

为了检验不同行政级别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城市为保护本地城镇居民就业和控制城市公共服务溢出而制定的户籍管制政策的差异,本文构建了下面一个简单的经验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Hr_{it} = \alpha + \beta_1 Empl_{it} + \beta_2 Fina_{it} + \beta_3 Agdp_{it} + \alpha_i + \delta T + \mu_{it} \quad (1)$$

其中, Hr_{it} 是户籍率,表示城市的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值; $Empl_{it}$ 为就业形势指标,表示城市的人均城镇单位就业岗位数; $Fina_{it}$ 为公共服务支出指标,等于城市的人均科教财政支出; $Agdp_{it}$ 为控制变量,表示城市的人均 GDP; α_i 为影响户籍率但又不随时间变化的所有无法观测的因素,比如城市的历史、文化、社会 and 自然条件等; T 为时间虚拟变量,2000 年取值为 0,2010 年则取 1; i 为城市; t 为时间。

户籍率 Hr_{it} 可以衡量城市的户籍管制的程度。如前文所述,一些学者使用人口迁入率来衡量户籍管制程度,还有学者使用新增户籍人口与新增移动电话用户数之比来衡量,但由于统计数据误差的存在及可得性问题,上述方法计算的结果与真实的城市户籍管制水平有较大差距。因此,本文选择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之比来衡量户籍管制。常住人口包括拥有本地户口的户籍人口和不拥有本地户口的外来人口,绝大多数外来人口都希望获得本地户籍,但由于户籍管制,并非所有常住人口都能获得本地户籍,因此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值越小则户籍管制越严格。

人均城镇单位就业岗位数 $Empl_{it}$ 可以较好地反映城市的就业形势。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包括所有在国有单位、集体单位、三资企业等单位就业的人数,该指标数值越大则该城市的就业形势越好,户籍管制水平就越低,户籍率就应该越高。因此可以预期,该指标的系数为正。

人均科教财政支出 $Fina_{it}$ 代表公共服务支出水平,选择该数据一方面是因为数据的可得性问题,另一方面科教支出是更具有排他性的公共服务支出,可以体现出户籍管制所带来的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在享受公共服务上的差别。公共服务支出水平越高,对人口流入的激励越大,户籍管制就越严格,因此该指标系数预期为负。

人均 GDP 指标 $Agdp_{it}$ 为控制变量,由于城市的人均 GDP 与就业形势和公共服务支出水平呈正相

^① D. J. Solinger, "Citizenship Issues in China's Internal Migration: Comparisons with Germany and Japa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4, No. 3 (1999), pp. 455 - 478; Feng Wang and Xuejin Zuo, "Inside China's Cities: Institutional Barriers and Opportunities for Urban Migran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9, No. 2 (May 1999), pp. 276 - 280.

^② 付文林 《人口流动的结构性障碍: 基于公共支出竞争的经验分析》。

关，并且同样会影响户籍率，忽略该指标会造成回归系数的偏误，因此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方程。

由于无法观测的历史、文化、社会和自然条件等因素 α_i 的存在，并且它与解释变量相关，忽略它将会造成回归结果的偏误。对此，我们取 $t = 2000$ 和 $t = 2010$ 两个年份的数据之差，即对（1）式进行一阶差分，将非观测效应 α_i 消除，从而得到一阶差分回归方程：

$$\Delta Hr = \delta + \beta_1 \Delta Empl + \beta_2 \Delta Fina + \beta_3 \Delta Agdp + \mu \quad (2)$$

但是，差分变换不仅能够消除非观测效应，也会掩盖行政级别、所在区域等因素的实际影响。对此，本文采取的办法是在进行计量分析时，分别对不同行政级别和不同区域的城市样本进行回归计算，通过对比这些城市的回归系数来验证结论。

将（2）式代入统计数据，就能得到回归系数的无偏估计。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根据普查数据可以计算出全国 286 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户籍率指标。由于重庆虽然为直辖市，但是与北京、天津和上海等直辖市的情况有所不同，其各项人口指标与一个省的口径类似，因此本文将重庆剔除在样本之外。对于人均城镇单位就业岗位数、人均科教财政支出和人均 GDP 指标，则从相应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上获得。由于统计年鉴上部分城市的数据缺失，剔除相关城市样本后，共得到 261 个城市的两期平衡面板数据。

（二）实证结果分析

1. 描述统计分析

表 1 列出了用户籍率衡量的 2000 年和 2010 年户籍管制排名前 20 名的城市。从排名可以看出，广东省的 5 个城市包揽了 2000 年户籍管制排名的前五名，2010 年广东也有 4 个城市入围前五。可见，人口流入大省广东的户籍管制总体上十分严格。无论在 2000 年还是在 2010 年，户籍管制排名前 20 的城市中，北京、上海两个特大城市都榜上有名，天津也进入了 2010 年的前 20 名，“计划单列”城市则分别有 6 个和 8 个，省会以上级别的城市分别各有 12 个，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中分别有 14 个和 15 个。可见，户籍管制严格的城市普遍行政级别较高；在户籍管制排名前 20 的城市中，东部地区城市分别占据 14 个和 18 个，而中部地区分别只有 1 个和 0 个，西部地区也只有 5 个和 2 个。可见，户籍管制严格的城市普遍位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总体来说，户籍管制排名和预期比较吻合，说明用户籍率指标来衡量户籍管制水平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表 1 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时期城市户籍管制排名（部分）

名次	2000 年		2010 年	
1	深圳	0.178	东莞	0.221
2	东莞	0.237	深圳	0.251
3	中山	0.566	中山	0.478
4	珠海	0.598	厦门	0.510
5	佛山	0.623	佛山	0.516
6	厦门	0.639	苏州	0.609
7	海口	0.691	上海	0.614
8	广州	0.705	广州	0.635
9	乌鲁木齐	0.790	北京	0.641
10	上海	0.806	珠海	0.671
11	北京	0.816	无锡	0.732
12	昆明	0.832	惠州	0.734
13	焦作	0.845	宁波	0.755
14	苏州	0.851	嘉兴	0.759
15	无锡	0.854	天津	0.761
16	银川	0.857	贵阳	0.779
17	惠州	0.864	乌鲁木齐	0.781
18	柳州	0.874	海口	0.784
19	呼和浩特	0.874	常州	0.786
20	南京	0.889	南京	0.790

2. 计量结果分析

表2列出了对方程(2)进行估计的结果。其中,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分别是对全部261个地级以上城市样本、51个国务院批准具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样本和省会上城市样本进行回归估计的结果。模型4、模型5和模型6分别是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城市进行回归估计的结果。

表2 计量回归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变量及参数	地级以上城市	具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	省会级以上城市	东部地区城市	中部地区城市	西部地区城市
$Empl_{it}$	0.153 *** (9.74)	0.112 (1.20)	0.000 (0.00)	0.181 *** (3.86)	0.091 (1.30)	0.090 (0.82)
$Fina_{it}$	-0.606 *** (-6.46)	-0.772 *** (-3.38)	-0.813 *** (-3.14)	-0.599 *** (-3.05)	-1.003 (-1.57)	-0.285 (-0.66)
$Agdp_{it}$	-0.023 *** (-15.92)	-0.022 *** (-4.13)	-0.021 *** (-3.18)	-0.020 *** (-4.79)	-0.023 ** (-2.55)	-0.024 *** (-2.99)
常数项	0.134 *** (23.65)	0.121 *** (4.57)	0.108 *** (3.29)	0.097 *** (6.15)	0.171 *** (5.66)	0.146 *** (5.09)
Adj-R ²	0.710	0.425	0.399	0.359	0.262	0.255
F统计量	46.97	13.31	8.30	23.37	10.33	7.72
城市数	261	51	34	121	80	60

注: 1. 括号内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统计显著; 2. 模型(1)的回归结果为加权OLS结果,其余模型的回归结果都通过了同方差检验。

对于影响城市户籍管制程度的就业形势,模型1的结果显示,人均城镇单位就业岗位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从全国范围看,城市的就业形势越好,当地的户籍管制就越趋于放松,回归结果符合理论推断预期。模型2的人均城镇单位就业岗位回归系数虽然也为正,但是不显著,模型3的回归系数不仅不显著,而且几乎为零。这表明随着样本城市的行政级别提高,城镇就业形势对城市户籍管制政策的影响变小。这是因为,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往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服务业比重大,提供的就业岗位也较多,因此受到的就业冲击小,这些城市的政府也不会因为担心就业不足而提高户籍管制。模型4的人均城镇单位就业岗位系数显著为正,与模型1相同,这表明东部地区城市的就业形势越好,当地的户籍管制就越放松。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是不显著,这表明中西部地区城市的就业形势对城镇户籍管制政策的影响不显著。这是因为,中西部城市主要是人口流出地区,虽然经济欠发达,城镇单位就业岗位少,但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到东部地区就业,因此本地的就业压力也较小,这些城市的户籍管制政策与就业形势的相关性也不显著。

另外,模型1~3的结果还显示,人均科教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对各个行政级别的城市来说,以人均科教支出为代表的人均公共服务支出越高的城市,户籍管制水平就越严格。同时,模型1~3的回归系数绝对值依次增大,这表明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户籍管制政策对公共服务支出增加的反应越强烈,也就越会因为担心公共服务溢出而加强户籍管制。该回归结果符合理论推断的预期。模型4的人均科教支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而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系数虽然为负但是不显著,这表明东部地区城市相对于中西部城市,户籍管制政策对公共服务支出增加的反应更强烈。这是因为东部作为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相对更高,并且迁入人口多,因公共服务溢出而增加的财政负担较大,从而更倾向于通过加强户籍管制来控制公共服务的溢出效应。

四、结 论

作为户籍制度的构成要素,保护就业、控制公共服务溢出仍是户籍管制政策的决定因素,并且不

同行政级别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城市的户籍管制政策对就业形势、公共服务支出变化的反应程度也不相同。根据本文的分析结果,就业形势越严峻、公共服务支出水平越高的城市,户籍管制程度越强;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通过户籍管制来控制公共服务溢出的倾向越明显,但保护就业的倾向不明显;东部地区城市较中西部地区城市的户籍管制对公共服务支出增加的反应更为强烈,利用户籍管制来保护城镇就业和控制公共服务溢出的倾向也更为显著。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改革户籍制度、破除户籍管制以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劳动力市场乃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改革不能简单冒进、搞一刀切,而是应该充分考虑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的差异,分类改革,循序渐进。受传统体制和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我国的社会财富、资源和行政权力大多集中于行政级别较高和经济较发达的城市,这些城市往往依靠其较高的行政级别和区位优势在国家和地区的资源配置上占据优势,在社会再分配过程中进一步汲取了更多的财富和资源,从而产生了对外来人口迁入大城市的较大激励。为防止城市大量失业和公共财政不堪重负,户籍管制成为了这些城市政府的必然选择。因此,要从根本上改革户籍制度,首先要改变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的态势。这意味着,一方面要改变社会资源、财富和行政权力向这些城市集中的模式,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要提高中小城市、中西部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促进中小城市、中西部地区城市的经济发展,加快承接大城市和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促进城镇就业,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A Study on the Differences of Hukou Regulation between Cities

Zou Yinan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Cities with higher hierarchy rankings or located in more developed regions, face greater population pressure than cities with lower hierarchy rankings or located in less developed regions. It is because greater amount of fortunes, resources and political power are gathered in these cities. As a result, the Hukou policies, which have the function of protecting local jobs and preventing the externality of public expenditure, vary from city to city. With the panel data of 261 cities in China in 2000 and 2010, respectively the 5th and 6th census year,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kou regulation and employment situation is negativ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kou regulation and externality of public expenditure is positive.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kou regulation and externality of public expenditure is significant in cities located in eastern part of the country, but not significant in cities with higher hierarchy ranking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the externality of public expenditure is significant in both higher hierarchy ranking cities and eastern cities.

Key words: hukou regulation, city difference, employment, public service

(责任编辑: 史云鹏)